

以媒抗争： 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研究

白红义

摘要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运动不仅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二者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逻辑。媒体是社会运动所能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中国，媒体尤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案例，通过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媒体策略揭示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媒抗争”的分析概念，丰富既有研究对社会抗争资源动员的讨论。

关键词

以媒抗争、社会运动、媒体近用、媒体策略

作者简介

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电邮：loiter2001@126.com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一般课题《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例》（编号：2014BXW004）的成果。

Resistance by Media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ern Old City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Nanjing

BAI Hongy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for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 Specificall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Nanjing, the article show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mass media and one social movement, talks

about different media strategies developed by two types of actors, and put forward the analytical concept of “resistance by media”.

Keywords

resistance by media, social movement, media access, media strategy

Author

Bai Hongyi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loiter2001@126.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Media and Movements as Interacting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an Urban-Heritage-Protecting-Movement in Nanjing” funded by Shangha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2014BXW0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增长主义”的影响,中国各地开启了一系列“以土地利益和空间效益为指向的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和土地开发活动”(陈映芳,2008)。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不少著名的历史建筑、街区、古迹被以旧城改造等名义拆迁,由此也激起了一系列旨在保护这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运动。之所以称之为社会运动,是因为在保护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反增长联盟”,他们长期开展抑制和反对城市增长机器的集体行动(陈浩,张京祥,林存松,2015)。社会运动正是由团结起来的人群所发动,通过持续性的集体挑战,意图改变社会现状的行为。在中国民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有限的情况,社会运动的出现可以彰显某一类型的问题,表达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仍处于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社会自我保护的作用”(马骏,2010)。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能在中国社会出现,而能够演化成社会运动形态的集体行动更是少见。环保运动因其“嵌入性”(Ho,2007)而成为少数能够以社会运动形态出现的集体行动。这种“嵌入性”与环保运动的议题高度相关,由于关注生态与自然的维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道德感,不仅能争取各种社会资源与群众支持,也能获得国家权力的认可(潘永强,2008:21)。

本文研究的城市遗产保护运动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城市遗产是指和“人”有密切社会关联的生活容器或者是谋生来源工具,建筑物、住宅聚落、古市街、产业区乃至历史文化名城本身都属于城市遗产。对城市遗产的保护除了要注意发挥它的使用价值外,还要注重对象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是对城市遗产的物质保护,而且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沈海虹,2006:5)。城市遗产保护运动常常是在特定的城市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被迫发起的,是对当下正如火如荼的城市开发运动的一种抵抗。之所以要以一种社会运动

的形态来推动对城市遗产的保护，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城市遗产在城市开发运动中受到大规模“建设性破坏”，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城市遗产保护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体制、决策困境有关。问题出现时无法通过常规机制来解决，为了实现保护的目，行动者必须动员起体制内外的资源，发动政府内的盟友、社会知名人士、大众媒体共同介入，以社会运动的形态实现常规政治无法快速有效处理的难题（陶文静，2013）。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是近年来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并取得相对成功的城市遗产保护运动，各方的努力最终促使原本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模式转向社区更新的旧城复兴模式，成为日渐兴起的“反增长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陈浩，张京祥，林存松，2015）。

作为南京建城史的发源地，南京老城南自六朝以来一直是南京商业、手工业及居住最发达的地区，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公共空间之一，也是最能体现南京传统风貌的地区。1982年，南京成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此后相继编制了84版、92版和2002版《南京历史名称保护规划》，对古城保护的范、内容、发展策略等方面有了明确的论述。在历年来制定与更新的规划方案中，老城南地区一直被列入重点保护范围，但这些保护规划却未能给予老城南强有力的庇护，自2006年以来，南京老城南的拆保之争已经引发了两次公共事件。第一次危机发生在2006年8月，南京市相关部门将15.4万平方米毛地划拨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商业用途开发，拟在旧址上兴建办公、别墅、酒店等物业。老城南的传统民居开始被大规模拆迁，16位国内著名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做出批示，拆迁才得以平息下来。然而，2009年初，南京市再度推出了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计划，许多原住民尽管不愿搬迁，却无法阻止拆迁工作，传统民居再度遭到大规模破坏。2009年4月，29位南京当地专家学者联名投书建设部、文物局、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再次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派出调查组加紧调查处理南京老城南拆迁事件。前往现场调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国务院调查组均对当地的拆迁行为进行了否定，动迁工作得以暂停。随后，南京市政府启动了《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与整治规划》的编制，经过各方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了以保护为基础的复兴原则，改变了政府对老城南再开发的目标定位与运作方式，至此老城南地区的开发与保护之争告一段落（陈浩，2011：20-25）。

南京老城南的遭遇不过是中国城市开发运动的一个缩影。在2006年和2009年短短的几年间，地方政府两度不顾民意强行启动危旧改造计划，彰显其意图之坚决。它的幸运在于，南京当地有一批热心城市遗产保护的知分子勇于行动，省内外媒体长期关注老城南的保护议题并形成相互联动，原住民充分利用体制内外途径发起

草根抗争，在多方行动主体的综合作用下，事件取得了阶段性的解决。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拆迁引起的议题，但这一事件并未陷入城市业主维权的框架，由于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等文化精英的介入，将其与文化、记忆、历史等勾连起来，成为一场城市遗产保护运动，赋予了足够的正当性和道德感，这也是地方政府在面对知识分子和原住民的抗争时不得不予以考虑的因素。行动者们充分利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缝隙，通过联名信等方式呼吁来自中央高层的干预，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正当性话语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整个事件在大众媒体上有充分的展示，既有动态消息的连续报道，又有追根溯源式的深度报道，成为保护运动中最重要政治资源。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Rohlinger & Vaccaro, 2013）。邓力（2013：13-16）将现有研究概括为批判、关系和策略三大取向：批判取向主要讨论媒体报道的“抗议范式”（protest paradigm）对社会运动的损害；策略取向将媒体看作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资源与平台，为获得媒体关注，需针对媒体运作规律发展出特定的“媒体策略”；关系取向的研究认为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是一种“交易”，双方都想付出最小代价而获利，并在意义的争夺中获胜。三种取向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批判取向所提出的“抗议范式”是以媒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策略取向所提出的“媒体策略”则以社会运动或抗争政治为中心；而关系取向所提出的竞争性共生关系则考察二者出于各自目的在影响公共论述过程中发生的互动。

在现有研究中，依托新闻报道文本展开分析是常见做法，着重讨论媒体如何呈现特定的社会运动事件。本文则试图将媒体与社会运动放在一个互动过程中来讨论，考察二者在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在实践中，二者的互动关系被具化为“作为新闻生产者的记者”与“作为消息来源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依据侧重点的不同，可以进行两类研究：一类是以记者和媒体为研究主体，看其如何在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将社会运动事件转换为新闻；另一类是以行动者为研究主体，探讨其如何接近和使用媒体，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本文正是从后一种视角出发，希望了解行动者为了近用媒体，发展出了哪些媒体策略？这些媒体策略的效果如何？不同主体的媒体策略是否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老城南事件发生期间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少量对这一事件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二是对老城南保护运动中的关键性人物的访谈，包括组织者、专家、撰写过相关报道的记者以及当地居民。此外，笔者曾经作为记者参与了老城南事件的报道，这段经历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社会运动的过程和情境了解相关行动者的角色和作为。

二、媒体近用与媒体策略

在现实中，社会大众在媒体上发言的机会并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与发言者的个人身份、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社会属性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政府官员、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是最常出现在媒体中的消息来源（Sigal, 1973）。要想在大众媒体上发言就涉及到一个“媒体近用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的问题¹，即政府与民众接近与使用媒体的权利（郑瑞城，1991）。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由于媒体的集中化与商业化日趋加深，沦为权势阶层控制舆论的工具，使得不同意见的表达变得困难起来，由此倡议将“接近使用媒体权”作为新的言论自由权利（Barron, 1967）。由于社会大众缺乏在主流媒体发声的机会，如果媒体近用权不能得到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只能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而不是多数人的自由（林子仪，1991）。媒体近用权具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意义：消极意义是指接近使用媒体所提供内容的权利，积极意义是指接近使用媒介载体而成为媒介内容一部分的权利（郑瑞城，1991）。

一般而言，社会运动的出现是为了改变主流社会中不合理的制度、政策或观念，在运动的各个环节如宣讲理念、动员大众、招募成员等都离不开大众媒体这个公共论坛，因而在大众媒体上“发声”以彰显其正当性就显得极为重要。但在现实中，与政府、大公司或社会精英阶层相比，社会运动的媒体近用能力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而在成功近用到媒体的社会运动中，社会运动的议题、社会运动组织的资源和能力等是决定其能否引起媒体关注的重要因素（Andrews & Caren, 2010）。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媒体的属性和特征，发展出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媒体策略吸引媒体的报道十分重要（Ryan, 1991）。尽管社会运动属于非官方与边缘消息来源，但只要策划合适的媒体策略仍有机会可以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侯政男，2012）。事实上，由于往往有不同的消息来源在竞争着媒体的论述机会，即使是那些具有权力的消息来源也不能仅仅依靠既有的权力和资源优势，还需要有成功的策略行动，才能获得媒体关注及报道（Schlesinger, 1990）。这些研究都指出恰当的媒体策略的重要性。邓力（2013：84）则认为，媒体策略的概念背后隐含着一种将媒体静态化处理的思路，媒体似乎具有某些一成不变的属性，发展出相应的媒体策略就能令社会运动把握好大众媒体这个工具，以动员更为广泛的公众。这种以社会运动为中心的取向无法解释媒体与社会运动如何按照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互动中定义、争论、解释抗争事件，并让事件发展的动态机制。因此，她在对番禺垃圾焚烧的案例研究中提出“媒体互动策略”，以描述行动者与媒体发展出的较为平等和契合的互动关

系。不仅强调行动者如何开发媒体资源，还强调行动者如何去评价与自身相关的新闻报道，并利用这些信息作为行动依据。

这种关系模式的界定与中国目前特殊的媒体与抗争行动的互动形态有关。尽管国家倾向于限制媒体对抗争行动的报道，但是市场化媒体仍然愿意通过临场发挥、策略突围等行动策略突破限制，高度介入对敏感议题的报道，从而形成了较为活跃的互动形态（李艳红，杨梵，2013）。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很多抗争之所以能见诸媒体更多依赖于部分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能动性，而非抗争者自身（吴畅畅，贾佳，2011）。媒体会依据国家权力对议题控制程度和报道空间的大小来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框架和话语方式建构运动（黄月琴，2010）。媒体不仅发挥着社会动员、认同建构、框架整合等功能（林芬，赵鼎新，2008；孙玮，2007，2009；聂静虹，王博，2013），在一些案例中它也作为“调停者”消除民间和官方的对立框架，使得民间抗争者的诉求可能为政府接纳，并最终带来政策的回应（曾繁旭，2013）；甚至作为抗争专家为运动设置抗争目标、提供抗争技术，成了运动中新的参与者（吕德文，2012）。这些研究强调了媒体的能动性，展示出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面向。在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警惕媒介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不能漠视行动者的主体性。在日益涌现的中国抗争事件中，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事件得以被报道？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媒体报道同一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倾向和角度？为什么这一事件是这样被报道的而另一事件却有着不同的报道框架？这些问题仅从媒体一方着手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还要关注到社会运动的媒体近用、策略行动、议程设置等能力。媒体为部分社会运动开辟了媒体近用的机会，对行动者而言，他们有可能通过近用媒体被传播赋权，但不同行动者的媒体近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会影响与媒体的互动效果。

本文赞同互动观念的引入，将本案例中社会运动和大众媒体之间看作一种“对话”模式（dialogical model），即一种随着时间发展的互动性、反思性关系。记者和行动者都是具有知识能力的策略行动者，在互动中寻求了解和使用对方的话语（Barker-Plummer，1995）。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决策模式是一种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内参模式”，一些行业内的知识精英通过政策建议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改变，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的民间组织成立较晚，力量也比较微弱，公众对这一领域保护活动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均不高，参与的渠道也很少。这一现实决定了城市遗产保护运动的主要行动者是一些相关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分子，以及与被保护区域有密切关联的“在地型个人”（陶文静，2013）。老城南保护运动也不例外，行动者实际包括了两个群体，一个是被拆迁地区的原住民为主的草根群体，一个是以29

位参与公开呼吁的南京本地学者为主的知识精英。如果仅是草根群体的抗争，老城南保护很难吸引到如此众多的媒体关注。知识精英并不是老城南拆迁的直接当事人，但却相当程度地卷入到了事件中，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行动主体，他们对事件的认知更深地影响到了媒体的报道框架。此次运动就为我们考察不同行动者之间媒体近用能力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案例。

三、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

拆迁冲突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缩影，拆迁议题则是近年来媒体报道的热点议题，拆迁冲突以及对拆迁的抵抗和维权活动经常受到媒体青睐（郑雯，2015）。但是，拆迁问题及抗争活动的普遍存在又使得它在近年市场化媒体的报道中面临一个困境，即过于普遍存在和经常被报道使得这一议题逐渐削弱或丧失了新闻价值所要求的异常性和新鲜感。在此过程中，媒体往往需要有意地从此类逐渐显得普通的拆迁和抗争活动中寻找新鲜的元素（李艳红，杨梵，2013）。这种元素有时可能是抗争的激烈形式，如拆迁事件中抗争主体的“自焚”（吕德文，2012）；有时候则可能是特殊群体成为拆迁的主角，如艺术家群体针对艺术区拆迁的抗争（李艳红，杨梵，2013）。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当代中国如此普遍的拆迁冲突和事件中，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形式、特征或有特殊主体参与的拆迁或抗争行动，才有可能重新受到媒体的关注。

本文所研究的老城南保护运动与李艳红和杨梵研究的案例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行动主体来看，专家学者和艺术家都属于精英阶层。在一般拆迁的报道中，拆迁所牵涉的利益主体往往是居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较少涉及社会的中上层。因此，当艺术家这个传统上被认为是知识精英阶层的群体遭遇拆迁，并采取行动进行抗争时，这本身即被认为具有了“新鲜感”和“新闻价值”，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青睐（李艳红，杨梵，2013）。参与老城南保护的则以南京当地的专家学者为主，还有一些作家、媒体人。作为当地的知识和文化精英，这些“名流”（celebrities）本身就可能对社会运动产生积极影响（Meyer，1995）。两个案例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抗争诉求和抗争话语的不同。在李、杨的案例中，艺术家群体是利益涉入型参与者，他们的诉求与其他社会主体面对拆迁境遇时的诉求非常相似，即都立足于维护自己的“私利”，在“维权”的主体框架下来阐述自身诉求，将开发商的拆迁行为视为是对艺术家基本权益的侵犯（李艳红，杨梵，2013）。在老城南事件中，知识分子们则是价值涉入型参与者，尽管不是拆迁事件的直接受影响者，但由于他们将事件与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传统等文化生活勾连起来，老城南的拆迁就不仅仅是对拆

迁户个体私利的侵害，同时也是对城市公共生活的侵害。由此，拆迁议题也就获得了媒体报道所需要的“公共性”。

早在2009年1月，老城南危改计划就通过《南京日报》《江南时报》等当地媒体公之于众，但这一期间原住民发起的抗争行动并未在媒体上有所体现，直到2009年4月，29位南京当地专家学者“联名上书”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这封由建筑学家、文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组成的专家团体共同签名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书》被送至国务院、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类似古时“公车上书”的政治参与形式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2009年5月，《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使这起事件一举进入全国媒体的视野，激发了后续的报道和评论。该告急书不但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也使得国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调查，直接叫停了南捕厅拆迁改造工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29位专家的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也就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从2009年6月开始，关于老城南拆迁的负面性评价迅速增加，矛头主要指向南京市政府对于该街区的毁灭性改造。不仅南京本地媒体、外地媒体，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境外媒体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报道，为知识分子和原住民的保护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撑。在这一过程中，专家学者们与媒体的良好互动体现出他们高超的媒体近用能力和媒体策略。

第一种形式是知识分子凭借其文化资本直接在媒体上发言。参与签名的29人多数是具有特定学科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参与媒体发言的形式也因此具有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类是知识分子经常作为专家消息来源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以其专业知识提供观点。采访专家是记者在消息来源方面经常使用的工作常规之一，而老城南保护本身就牵涉到历史、规划、建筑等具有一定专业性的知识，记者必须依赖这些专业人士的解读才能确保报道的准确和深入，专家成为记者们最多使用的一类消息来源。除了参与签名的周学鹰、薛冰、杨永泉、梁白泉等人外，实际起草此次告急书并长期关注中国古城保护的姚远也频频以专家身份出现在报道里。还有一类则是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更系统地阐述个人观点。这种形式要求知识分子本人要拥有一定的媒体人脉，能找到合适的平台发表文章。就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姚远和薛冰比较多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²姚远在《瞭望》新闻周刊和《新京报》上各发表过两篇评论，薛冰则在《新京报》和《东方早报》上各有一篇评论。这三家媒体恰恰也是在老城南保护运动中发表报道和评论最突出的三家媒体，其中《瞭望》新闻周刊是老牌的时事新闻杂志，《新京报》和《东方早报》则是国内主流都市报的代表性媒体，在舆论场上享有盛誉。

第二种形式是知识分子采取具体的行动“制造”新闻事件吸引媒体的报道。作

为一个拆迁议题，发生在南京老城南地区的这起事件最大的新闻点在于，29位当地专家学者联名写信给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未能阻止地方政府的危改计划，拆迁仍在当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老城南保护建筑的认定。早在2003年，东南大学教授吴明伟在进行南捕厅历史街区更新保护规划时，曾受南京建设部门委托对该街区进行梳理，共列出70余处需保护的建筑。而在实际操作中，开发商则认为有保护价值的只有36处。2009年上半年，由于受到“镶假牙”、“专家上书”等舆论压力的影响，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曾委托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对街区进行全面调查，共认定拟保护建筑66处。然而这次调查却遭受了广泛的质疑：项目指挥部称经“实地勘查、访谈求证、图史互证、文献考释”的方式进行甄别，但老城南原住民却表示，“根本没有人来过啊”。因此，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史志专家杨永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史志专家吴小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姚远等人共同志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向南京市文物局提出将南捕厅地区109处传统民居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申请。该申请得到了市一级的关注，并被转发至市建委、规划局、文物局、白下区政府、城建集团等，获得了相关领导批示。南京本地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再比如，2009年6月3日，南京市规划局牵头组织联合签名的专家实地参观老城南及与相关部门座谈，许多南京当地媒体不准进入会场，但通过与会专家的“转述”，媒体还是报道了此次座谈会的一些情况，使得专家的诉求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可以看到，类似的媒体策略在老城南事件中被多次使用，如2009年5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南捕厅现场对南京历史街区保护采取的“镶牙”模式进行了严厉斥责，以及6月随后而来的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在现场的调查与座谈，媒体都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报道，而这都是记者不在“现场”的情况下，通过与会的专家学者们披露出来的。

应该说，作为一方行动主体的知识分子们十分谙熟于媒体报道的规律，在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报道和评论之间娴熟地调配资源。早在保护运动开始之初，媒体就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盟友。³在联络媒体进行动员的过程中，姚远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⁴首先，他具有很高的媒介素养，能够认识到媒体对于运动的重要性，在访谈中也对笔者表达了他对媒体功能的理解。2006年老城南第一次遇到拆迁危机时，姚远已经充分体会到了媒体对于他们的帮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29人呼吁”视作一次迎合媒体需求的策略，对媒体而言，它的新闻价值要远高于草根阶层的拆迁抗争。而且媒体人作为知识分子，也容易对专家学者们的抗争诉求产生理解和同情。⁵这一模式在2006年已经出现，但保护行动未能真正成功，近50万平方米的历史

街区只残存了几个孤立的文物点。直到2009年再次采用这一模式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⁶除此之外,姚远还很注意新媒体的使用,他在新浪博客上注册了自己的个人博客,不断发布中国各地古城、历史街区、城市遗产等保护的政策、新闻。老城南事件期间,他以此为平台连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新媒体的使用无疑是在大众媒体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平台,笔者在接到位于广州总部的编辑派来的题目后,首先找到的就是姚远的博客,然后联系到当时正在日本访学的姚远,从他那里获取了所有29位参与签名者的姓名、身份和电话。这份名单里有的名字被标注了红色,“红色是比较铁杆的”。他还建议笔者选择采访对象的顺序,“最好先薛冰、杨永泉、邹尚、周学鹰,他们会从历史、民俗、建筑方面有一个全面介绍。蒋赞初、梁白泉、韩品峥、陶思炎、刘叙杰这几位老先生,颇有权威性。”⁷其次,姚远还有不错的媒体人脉。《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王军长期关注和报道历史遗产保护,而姚远也长期关注古城保护,二人在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宣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上有过交集,有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所以,在老城南事件中,《瞭望》新闻周刊多次刊发评论和报道推动事件的发展,比如2009年5月11日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蒋芳采写的《南京:为了命悬一线的老城南》就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报道。除了中央级媒体外,姚远还找到了《南方周末》一位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报社中层,通过他联系到《南方周末》记者前来采访。考虑到《南方周末》多年来在公共舆论中的地位,可以发挥“媒体间议程设置”的作用,吸引更多媒体的关注。笔者所在的报社就是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后才决定关注这一议题的。除了姚远之外,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薛冰则在南京当地媒体圈人脉很广。他早年主编过《东方文化周刊》,现在又担任南京市作协副主席,属于当地的文化名人,因此与各家报社的文化口很熟悉。⁸通过采访,姚远等人还与南京当地媒体建立了一个密切的关系网络,《新华日报》记者王宏伟、《现代快报》记者胡玉梅、《江南时报》记者黄勇等都是长期跟踪报道老城南的当地记者。在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媒体,既有《瞭望》新闻周刊这样的中央媒体,又有《南方周末》这样拥有巨大声望的市场化精英媒体,还有在本地媒体市场举足轻重的都市报。姚远等人选择的媒体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又保证了足够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经由关键媒体的报道,又会吸引更多媒体的关注,进而打破了事件的地方属性,进入全国性的舆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文化精英拥有的媒体人脉和媒介素养是保证事件始终浮现在媒体视野中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他们对事件的界定也影响着媒体的报道框架,从最初的民生拆迁议题转化为城市遗产保护议题。

在中国报道抗争事件时,媒体既有其自身选择新闻的标准,又要受到宣传控制

体系的束缚。因此，与个人抗争事件相比，参与人数更多、波及范围更广的集体抗争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报道兴趣；对于集体的抗争行动，媒体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去政治化属性或策略的抗争行动，以降低报道的政治风险；同时，媒体还可能具有一定的阶级意识形态偏向，更加青睐社会精英群体参与的抗争事件；媒体并总是倾向于报道那些能够嵌入其日常报道结构，能够满足其日常信息需要的抗争行动（李艳红、杨梵，2013）。老城南保护运动则满足了上述所有条件。行动者在争取媒体报道时，不仅要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材料，还要认识到媒体本身的新闻操作规则因为审查而受到局限（邓力，2013：85）。熟悉媒体生态、了解媒体运作的一个好处就是，姚远、薛冰等人能够了解在现行体制下媒体作为的限度，而不会提出过高的期待。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媒体策略意味着行动者不仅要了解新闻业所处的结构性约束，还要在此基础上抓取突破的机会。南京本地媒体对老城南拆迁有着主动且持续的关注，像《江南时报》在各个时间节点都有或长或短的报道出来。在2009年6月3日举行的政府官员与签名专家的座谈会上，记者虽然被排除在会场之外，但始终留在当地等待采访机会。即使有不予报道的通知，也通过迂回或拖延的方式将会议的内容披露出来。可以说，此次保护运动的组织与动员离不开媒体的协助，这也正是行动者理解媒体报道所受束缚的基础。当本地媒体无法发声时，就广泛寻找和利用外地媒体的资源前来报道，通过外部压力倒逼地方政府使议题在本地媒体上脱敏。

四、作为草根阶层的原住民

南京老城南的原住民是此次保护运动中的又一个行动主体，正如一些对老城南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基本属于城市底层民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针对拆迁而发起的抗争也被称为草根抗争（张钊，2012）。以拆迁核心区域南捕厅历史街区为例，据何淼（2012：39）2009年7—8月对该街区25位未搬迁居民的访谈发现，其中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就有9户。她在2010年初对于110栋拟保留建筑内居民的调查则发现，7成以上被调查者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低于1500元，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5成以上的被调查者家庭人均住宅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居住空间狭小拥挤；94.7%的家庭配套厨房，但多为自己搭建或多户共用，67.4%的家庭没有配套厕所，完全依靠公共厕所；53.7%的家庭没有配套淋浴间，完全依靠公共浴室，现代家庭设施不足。从其收入和生活状况来看，老城南原住民处在城市的社会底层，能够调用的社会资源相当有限。除了那些依托自身条件发起的抗争之外，大众媒体的介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原住民

们也高度认可媒体的报道对于他们的拆迁抗争有利。张钊（2012：36）在当地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41.4%的受访者认为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媒体发布的消息对他们“很有帮助”或“有帮助”，家住泰仓巷的马邦保还在2010年底组织在街区内张贴标语，感谢媒体对于老城南的关注和帮助。

相对于专家学者们“主动”地利用媒体表达自己对南京老城南的观点和看法，原住民们则“被动”很多。首先，原住民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较为有限，虽然在不同媒体的报道里都能看到原住民作为消息来源出现，但这种“出场”很大程度是因为新闻写作的需要，通过个体生命故事的叙述增加新闻报道的细节，提高报道的可读性。杨国顺和马邦保是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两位原住民。《新京报》和《时代周报》的报道就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杨国顺写在自家大门上的一副对联：

6月20日，位于南捕厅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千章巷29号，这是一户18.9平方米大小的人家，石棉瓦的屋顶，枣红色的门。

墙面上有几行粉笔字：“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房不大三代人国共二党经两朝”、“视家为根，没根就没命”。

写下这些字的是屋主杨国顺，在老城南改造中，65岁的他是为数不多敢公开自己身份的原住民。

在来访者面前，他唠叨起祖上三代在屋檐下纳凉、遛鸟、喝茶、聊天的幸福时光后，开始伤心，然后难以平静地再说下去。

如果有拆迁人员上门做“思想工作”，要求限时搬迁，他就竖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被杨国顺称为“最后一道防线”。⁹

沿着千章巷进去，很容易看到杨国顺的房子。石棉瓦的屋顶，还有一扇枣红色的门。这间房子在南捕厅四期拆迁工程的范围内，但杨国顺拒绝搬迁。

杨国顺把鲜红的宪法封面贴在了墙面的左上角。宪法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拆迁人员上门，他就竖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回应。

他在墙面上书写了五行粉笔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宪法是母法，是国法。其它法皆子法”、“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房不大三代人国共二党经两朝”、“视家为根，没根就没命”。

杨国顺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签字的。”他说，“要么留在原地，要么强拆。”¹⁰

两篇报道都在开头引用了杨国顺的故事，一位拒绝搬迁、誓死抗争的原住民形象跃然纸上，而报道所潜藏的倾向也呼之欲出。客观地说，杨国顺能出现在报道中，首要的因素是记者本身的能动性。一则杨国顺的房子就在千章巷的入口，从此进入很容易看到他所撰写的粉笔字，符合新闻生产的效率原则和便利性原则。另外，与一般的被拆迁原住民相比，这些粉笔字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抗争剧目”，在记者眼中具有显著的新闻价值，原住民才能作为消息来源进入媒体报道之中。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适合成为消息来源，杨国顺和马邦保本身就是原住民中的抗争领袖，他们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也帮助他们成为记者偏爱的故事主角。在《时代周报》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老城南是属于南京人民的。把南京人赶绝了，南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说完这话，马邦保扭头向旁边站立的十多位拆迁户大声喊，‘你们同意吗？’‘同意。’众人齐声响应着他的问话。”¹¹

每逢记者来老城南采访，杨国顺、马邦保等人就会亲自带着记者在老城南实地探访，增强记者对抗争诉求的认同感。原住民们也乐意让这些抗争领袖代表他们发言。这些抗争领袖未必有很高的学历，但他们确是在居民眼中知书达礼，对问题领悟能力强，善于语言表达的领袖式人物。街区抗争领袖的另外一个特点还在于他们有着比较强的外联能力，与许多媒体和学者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如薛冰、周学鹰等人也与这些领袖人物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2009年笔者对马邦保的采访就是从薛冰那里找到电话联络好的。老城南拆迁吸引了大批媒体、学者和其他关心老城南的人，这些抗争领袖也抓住机会向调查者和访问者讲述当地的历史、生活环境和目前遭遇的窘境。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在现场进行调查时，马邦保还特地招待他品尝了正宗的七家湾锅贴，以求让这位前来调查的研究生能更深刻地体会老城南人的生活（张钊，2012：29）。但相应地，这些领袖人物就成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眼中的“顽固分子”。《南都周刊》刊发的记者手记描述道：“马师傅在电话中说，几天前，有人扬言要把他捅死。现在，他家门口，每天都有三四十位邻居聚集在一起，彼此取暖，彼此保护。”¹²由两位抗争领袖来应对媒体，既是媒体报道的需要，比如他们能够清晰表达观点、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细节等；同时，这也是原住民降低沟通成本、搭建沟通桥梁和网络的需要。抗争领袖并不能完全依靠“权威”或者“魅力”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扩散，还要充分运用网络结构与社会资源进行共识动员、传播抗争诉求，进而成为原住民与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建立关联的关键节点。

据张钊（2012：26）调查，42.9%的原住民尝试过向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提供新闻线索，18.5%的人向网络媒体发布消息。至少从笔者阅读老城南报道

的经验来看,这种近用媒体的方式收效甚微。当正常方式难以奏效时,发展出一些特殊的抗争剧目以吸引媒体注意便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路径。其中,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则以失败告终。从实际情况来看,老城南居民的抗争方式既包括比较柔性的与拆迁办拖延、在街区张贴大字报和撰写联名信等方式,也包括比较激烈的集体上访和成立“民众治安联防委员会”等手段。由此可见,老城南住户的抗争方式是多元的。只要是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策略,他们都会尝试运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抗争形式:

第一种是个体化抗争,采取极端手段维权。当大规模的拆迁开始时,南捕厅街区居民并没有形成联合化的行动,多是个体以相对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而这样的行为往往收效甚微,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与关注,也因其过于极端很难获得媒体的报道。¹³在何淼(2012:69)的论文中,一位原住民叙述的细节就非常典型:

“那次,有一户人家被逼着强拆,他们家就把孩子关在屋里,打开煤气,姐妹两人在门口堵着,威胁那些拆迁的人说他们要敢拆就点火,一起同归于尽。我看到这件事就赶紧打电话给‘零距离’(江苏电视台)要他们来现场拍摄,要曝光这种强拆的野蛮手段,结果电视台没敢来。我再打电话去问,‘零距离’说他们联系了拆迁办,拆迁办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媒体不要干涉。所以最后就没有来。”

第二种是建立日常防御机制。伴随着南捕厅历史街区拆迁工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相关野蛮拆迁、暴力拆迁事件的影响,居民开始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保护自己的社区共同体。如当地居民自发组织了“治安防卫队”,加强街区内的日常生活管理,尽量防止暴力事件的再次出现,形成了日常化的防御机制。据马邦保介绍:“拆迁之后,这一片的治安非常不好,经常有小偷进屋偷东西。还有一些政府派来的强制拆迁的人,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我们搬迁。有些手段真的是很过分!打人、威胁、剪电线……能想到的都用上了。我们从动迁到现在没睡过一晚安稳觉。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组织了治安防卫队,自发组织的,加强周边的巡逻,下半夜也有人值班。大家团结起来搞好这里的生活。”(何淼,2012:69)

第三种是发起大规模的政府信访与行政诉讼。在抗争领袖的带领下,原住民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集体行动。如2009年6月,南捕厅地区近百位街区居民在“区政府门口把路给堵了,让车不好行驶”,以此方法要求政府予以接待并

解决问题。2009年7-8月期间,老城南5户居民在老城南旧房改造中遭遇强拆,其中两户原住民利用法律武器就拆迁行为将白下区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两次行政诉讼均由30多位南捕厅历史街区的居民作为“后援团”,记录庭审细节,给予原告强大的精神支撑。《江南时报》2009年12月16日报道了老城南强拆惹出的“民告官”官司。

这些抗争行为很多并未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媒体对此不予关注,二是媒体获知了这些抗争信息,但并未在报道中体现。媒体如何处理这种抗争信息与抗争形式本身是否逾越了界限有关。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2010:75-76)把抗争分为有节制的抗争和逾越界限的抗争。有节制的抗争是在“政权所规定或容许提出要求的形式中”进行的,而逾越界限的抗争是指“那种越过了制度性的界限而进入到被禁止的或未知地带的抗争”。事实上,大多数抗争事件在开始时都是作为有节制的抗争事件出现的,只不过到了最后才演化成更大范围的逾越界限的抗争。在一般情况下,受制于宣传体制的约束,中国媒体能报道出来的抗争多为有节制的抗争,但只有那些具有新奇性的“表演式抗争”(黄振辉,2011)才有可能进入媒体的视野。“自焚”之类的极端化抗争方式之所以难以被媒体报道,与其逾越了界限有关,而组建联防队、集体立血誓¹⁴等组织化的抗争方式同样不在官方认可的界限之内。

反倒是一些司空见惯的抗争方式如果赋予其新意也有可能被媒体关注。与其他抗争类似,我们在老城南原住民的草根抗争中也看到了“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的表现。当地居民经常拿出强有力的国家法律条文及政策对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比如,在老城南居民中广泛传阅的《普通公民或被拆迁户应知法条(择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5年2月28日起施行(择选)》都是原住民为了抵抗开发商的强拆和地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从法律条文中摘选的对本方有利的条款。另外,他们也有将上级领导的讲话内容当成“法律”的情况。在一些街巷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住户写有“坚决拥护代市长季建业的任职发言”“什么人站在官僚资本主义方面,就是反革命派”字样的标语。原住民们从法律、法规、规则中寻求权利话语,将其视作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成为居民一条重要的行动策略。杨国顺把鲜红的宪法封面贴在了自家墙面的左上角就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他撰写的对联、打油诗等经常成为记者引用的素材。“以法抗争”如今并不稀奇,但杨国顺通过自己的文采赋予其强烈的表演性,增加了新鲜感,从而获得媒体的青睐。

应该说,原住民们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虽然意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

未能设计出适合媒体报道的抗争剧目。在接受过各路记者的采访后，这些抗争积极分子也会有意识积累这些媒体资源，在适当的时候寻求记者的帮助。笔者就南京老城南撰写的第二篇报道就是杨国顺打来电话告知政府要召开一个专家咨询会。在事件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的积极回应自然有新闻价值，这也是我所在的媒体作为一家周报罕见地刊发追踪报道的原因。在2009年7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进行的访谈中，作为抗争领袖的马邦保曾展示了其手中掌握的20余位各大主流媒体的记者的联系方式，并表示“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跟媒体反映”（何淼，2012：71）。由于包括南捕厅街区在内老城南地块的更新改造问题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热点，原住民也十分注意与媒体进行联合。从老城南的具体情况来看，虽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多是从历史文化保护等视角切入的，对老城南原住民生活现状及抗争行为的报道较少，但是他们仍然间接地帮助老城南居民传达了声音，向地方政府施压，并使得最后的几个街区得以幸存。原住民与媒体形成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共生关系（unequal symbiosis），他们进入媒体视野主要是“被动”地依赖记者的主动挖掘，原住民虽然试图主动向媒体提供线索或报料，但因不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而收效甚微，所以在原住民和媒体之间无法形成一种较为平等的互动策略，前文提及的向南京电视台“南京零距离”的报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五、讨论与结语

经由上述对知识精英和原住民两大抗争主体的媒体策略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体在此次保护运动中的显要作用。作为行动主体，首先要能够接近和利用媒体，然后才能涉及到推动媒体发布符合自身需求的报道。尽管既有研究一再强调了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在社会运动报道中的主导性角色，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行动者的能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在互动的视角下观照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着重探讨社会运动一方如何利用既有资源近用媒体，发展出合适的媒体策略吸引媒体关注并发表有利于运动的报道。媒体是抗争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抗争者能够动员的媒体资源不仅包含传播工具，如不同形态的媒体，还包括抗争者自身的媒介素养、技能以及所能调动的媒体人脉资源（周裕琼，杨云康，2017）。

本文把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中行动者主要借助媒体来进行社会抗争的现象称之为“以媒抗争”，用以描述当前中国社会抗争中行动主体能动地以媒体作为重要抗争资源和武器的传播现象。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很多研究的证实，而本文提出这一概念主要基于两点：其一，“以媒抗争”是把传统媒体作为主要抗争工具的抗争类型，从本质上说，它属于一种温和的、体制内的抗争手段；其

二,“以媒抗争”强调的是行动者在动员媒体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联系媒体和记者关注抗争行动、制造议题吸引媒体报道、为媒体报道设置议程等等。就本案例而言,行动者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他形式的抗争,如来信来访、起诉以及各类底层抗争,但效果却远不如通过媒体报道制造舆论压力来得快速和直接。在保护运动爆发的2009年,微博等社交媒体还远不如现在发达,因此这一案例依赖的主要还是传统媒体资源,行动者与他们的联系和沟通需要一定的人脉和技巧。而很多的抗争事件的行动者并不具有这些能力,往往是由媒体和记者发挥专业主义精神主动去发现和披露事件。但本案例从一开始就由行动者来主导着事件的传播过程,包括邀请哪些媒体来报道、何时报道、采访哪些消息来源以及如何报道等关键环节。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和作为草根阶层的原住民两个群体表现出的能动性存在很大差异。对知识分子来说,媒体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都是他们能够动员起来的抗争资源。一开始,他们也试图以联名信的方式获得中央高层的重视,“逼迫”地方政府停止拆迁。在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他们又通过主动联系媒体报道、提供专家信源以及发表时评等多种方式介入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地“施加”压力。他们还通过座谈会等形式与官方进行直接沟通,这些又构成了新的报道线索。媒体已逐渐成为他们能够利用的最主要的工具,并在传播过程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比如他们可以选择联系哪些媒体来报道、以哪种方式来近用媒体、为报道提供专家信源和认识框架。原住民则受制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除了他们自身的身体外,媒体是唯一有可能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与知识分子相比,原住民的能动性是相当有限的。他们主动联系媒体却以失败告终,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来采访的记者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报道线索、人物故事、向导乃至人身保护。

事实上,在具体的抗争事件中,很少能看到运用单一资源的行动,大多都是广泛地动员各种抗争资源。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多个概念描述抗争者能够动员和使用的抗争资源,如“依法抗争”(O'Brien, 1996)、“以法抗争”(于建嵘, 2004)、“运用关系网络作为武器”(石发勇, 2005)、“草根行动者”(应星, 2007)、“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董海军, 2008)、“依势博弈”(董海军, 2010)、“以身抗争”(王洪伟, 2010)、“表演式抗争”(黄振辉, 2011)、“悲情抗争”(王金红, 黄振辉, 2012)、“原始抵抗”(李晨璐, 赵旭东, 2012)、“情感抗争”(刘涛, 2016)等。这些不同概念的提出也表明了社会抗争方式的多样性,而选择何种抗争方式则与事件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行动主体可动员的资源、抗争对象的特征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文提出的“以媒抗争”则突出的是媒体在其中的重要性,“在一个缺乏各种抗争工具和组织形式的转型国家中,媒体

对于社会抗争的作用，值得特别强调”（黄煜，曾繁旭，2011）。需要指出的是，“以媒抗争”首先强调的是媒体在抗争行动过程中的核心或主要位置，但并不是说其他形式的抗争就无关紧要，正如本案例所显示的，行动者的告急书被媒体披露是事件得以成为公共事件的关键一步，为媒体报道提供了具有极强新闻价值的报道线索。此外，“以媒抗争”虽然关注的是行动者在近用媒体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但是并不能将媒体工具化，以为发展出特定的媒体策略便可以利用好媒体，媒体的定位、偏好、常规等也会反过来限制行动者近用媒体的能力和方式。因此，尽管媒体介入社会抗争事件很多，但大多数案例并不符合本文所指的“以媒抗争”。在老城南保护运动案例基础上提炼的这一分析概念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有其应用的局限性。

首先，这起能够引起全国关注的社会运动事件背后是数量更多不为人知的其它类型的集体抗争。相对于渐渐脱敏的城市区域的环保类抗争，失地农民、拆迁居民、维权工人的抗争更加频繁，但他们的诉求难以得到媒体报道。比较而言，本文概括的这种互动模式适用于一些政治宽松的领域，比如城市遗产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在城市遗产保护运动中，知识精英可以动员的资源不限于媒体，他们可使用的手段还包括民告官、内参、上书和提案（Yao & Han, 2015）。这些行动又能够为媒体提供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ies）（Gandy, 1982），成为新的报道焦点。

其次，从抗争主体的构成来看，这一互动模式更能够解释其抗争主体拥有社会资本与媒体资源的都市抗争。本案例作为一起城市遗产保护事件，其抗争主体实际是一群具有社会声望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为这一事件赋予了强烈的新闻价值，更易引起媒体关注。相较于底层农民或农民工，知识分子们可以动员的社会资源较为充分，与媒体互动的渠道也较多，沟通也更容易。原住民在媒体报道中大多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弱者身份出现，而作为抗争者的主体性却被忽视了。不同阶层在抗争方式、组织、资源和话语上的差异有可能导致运动结果的迥异（谢颖，林芬，2016）。

再次，从抗争事件的发生地来看，南京是一个媒体市场较为发达的地方。区域内既有江苏省属媒体，也有南京市属媒体，还有不少中央媒体驻南京的分支机构，当事件变得严重时，还引来大量外地媒体的关注。媒体不仅数量众多，行政导向的媒体和市场导向的媒体在报道旨趣上也有很大不同。政府对媒体的属地化管理以及媒体的蜂窝状结构提高了行动者近用媒体的可能性（夏倩芳，袁光锋，2014），使得一个较为发达的地方媒介市场已经成为都市抗争中的重要政治资源（曾繁旭，黄

广生, 2013)。

最后, 还要注意到媒体性质上的区别。本文案例中选取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市场化媒体, 除了少数专业主义倾向的媒体外, 多数媒体在报道中会看重报道对象具有的市场价值。本文提出的“以媒抗争”更适用于解释媒体卷入程度较深的抗争事件, 即在抗争发生之初媒体就已介入报道, 全程参与了事件的发起、高潮和落幕, 比如2009年的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邓力, 2013)。相对而言, 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或工人维权运动在获得媒体的关注时, 往往已经发展成为集体的游行示威等逾越界限的形式了, 在最需要组织与动员资源的抗争初期, 却得不到媒体的关注。由于媒体抗争的阶级化(曾繁旭, 黄广生, 李艳红, 2012), 他们展示的公共性也是具有阶级性的。

总之, 抗争议题、抗争主题、媒体市场和媒体性质等因素构成了老城南保护运动“以媒抗争”得以成功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 这些特定条件也可以视作评判事件是否属于“以媒抗争”的标准之一。老城南保护运动仍是一个主要基于传统媒体平台展开的案例, 随着新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以媒抗争”是否还将存在、如何演化是未来可继续追问的话题。

(责任编辑: 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我国台湾地区习惯使用“媒介近用权”的表达方式, 即为“媒介接近和使用权”的简称。英文中的Access一词就包含了“接近”和“使用”的意思。本文在以下的论述中统称其为“媒体近用权”。
2.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曾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有关老城南保护的论文, 但这类行业杂志受众面比较狭窄。
3. 姚远访谈资料, 2014年12月12日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青葱咖啡馆。
4. 2011年1月13日, 《人民日报》以《古城保卫战, 有这样一位“80后”》为题对姚远进行了专题报道, 显示其影响力也获得了党中央机关报的认可。
5. 姚远访谈资料, 2014年12月12日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青葱咖啡馆。
6. 《人民日报》: 《古城保卫战, 有这样一位“80后”》, 2011年1月13日。
7. 姚远采访资料, 2009年8月3日。
8. 薛冰访谈资料, 2014年12月12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某书吧。
9. 《新京报》: 《南京老城南拆改之争》, 2009年7月6日。
10. 《时代周报》: 《保护南京老城南: 注定的败局》, 2009年8月6日。
11. 同上。
12. 《南都周刊》: 《南京城南保卫战还在继续》, 《南都周刊》2009年9月11日。
13. 目前媒体上找到的拆迁自焚事件就发生在南京市玄武区。2003年8月22日, 一位名叫翁彪的拆

迁户纵火自焚。参见《外滩画报》:《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2003年9月4日。该报道因此获得《南方周末》2003年度致敬之年度社会关怀称号。

14. 2009年9月19日,评事街一带的141位居民共同签订了一份意在使街区所有利益相关住户共同进退、不逞匹夫之勇的《誓言》。每位参与居民需要签名、按血手印,并留下住址及联系电话。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2011),《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Tilly,C., & Tarrow,S.(2011). *Contentious Politics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陈浩(2011).《转型期中国城市住区再开发中的非均衡博弈与治理》.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京.

[Chen,Hao(2011).*The Mechanis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Imbalanced Politics in Urban Residential Redevelopment Projects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Nanjing University,Master Thesis.]

陈浩,张京祥,林存松(2015).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规划研究》,39(4),19-26.

[Chen,Hao.,Zhang,Jingxiang., & Lin,Cunsong(2015).Anti-Growth Politics i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n The Southern Old City Event of Nanjing. *Planning Studies*,39(4),19-26.]

陈映芳(2008).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社会学研究》,23(3),29-55.

[Chen, Yingfang(2008).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and Spac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Studies*,23(3),29-55.]

邓力(2013).《媒体、集体行动与公共性的建构:番禺反垃圾焚烧厂的个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香港.

[Deng,Li(2013).*Media,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ity:A Case Study of an Anti-incinerator Event in Pany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董海军(2008).“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8(4),1-25.

[Dong,Haijun(2008).The Weak identity as a Weapon: Subaltern Politics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for Right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8(4), 1-25.]

董海军(2010).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社会》,30(5),96-120.

[Dong,Haijun(2010).Based Game:A New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Right-Safeguarding Action in Grassroots Societ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30(5), 96-120.]

何淼(2012).《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生产:南京市南捕厅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变迁》.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京.

[He,Miao(2012).*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Urban Renewal:A Study on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Nanbuting Historic District in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侯政男(2012).新兴社会运动之媒体策略模式研究:以2010-2011年高雄同志游行行为为例.中华传播学会年会论文.台中.

[Hou,Zhengnan(2012).Media Strategies Model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A Study on

- “Kaohsiung Gay Parade 2010-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Conference Paper.]
- 黄煜,曾繁旭(2011),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中国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新闻学研究》,(109),167-200.
- [Huang,Yu & Zeng,Fanxu(2011).From “Not In My Back Yard” to Policy Advocacy:The Co-empowerment Model between Media and Protests in China.*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9),167-200.]
- 黄月琴(2010).《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2007-2009年国内系列反事件的媒介建构》.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武汉.
- [Huang,Yueqin(2010).*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Anti-Petrochemical Movement: Media Construction of Series of Anti-PX Events in China,2007-2009*.Wuhan University,Doctoral Dissertation.]
- 黄振辉(2011).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71-84.
- [Huang,Zhenhui(2011).Performance Resistance:Landscape,Challenge and Occurrence Mechanism. *Open Times*, (2),71-84.]
- 李晨璐,赵旭东(2012).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社会》,32(5),179-193.
- [Li,Chenlu & Zhao,Xudong(2012).The Primitive Resistance in Group Events: A Resistant Case Against the Environment in Village Hai,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2(5),179-193.]
- 李艳红,杨梵(2013).文化资本、传播赋权与“艺术家”都市空间抗争:对J市艺术区拆迁集体维权行动的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6),33-73.
- [Li,Yanhong & Yang,Fan(2013)Cultural Capital and Communicative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Contentious Action of Art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6,33-73.]
- 林芬,赵鼎新(2008).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6),93-119.
- [Lin,Fen & Zhao,Dingxin(2008).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A Relationship without the Constraint of a Hegemonic Culture.*Communication & Society*, (6),93-119.]
- 林子仪(1991).论接近使用媒体权.《新闻学研究》,(45),1-23.
- [Lin,Ziyi(1991).On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1-23.]
- 刘涛(2016).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9(5),102-113.
- [Liu,Tao(2016).Emotional Resistance:The Emotional Frame and Moral Grammar of Performing Resistance.*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69(5),102-113.]
- 吕德文(2012).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32(3),129-170.
- [Lv,Dewen(2012).Media Mobilization, Demolition-Resistant Familie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Reanalysis of the Event of Yihuang.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32(3),129-170.]

- 马骏(2010).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评论》,(1),3-34.
- [Ma,Jun(2010).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State-Rebuilding:China since the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3-34.]
- 聂静虹,王博(2013).“媒介框架整合”:中国媒体都市集体行动报道策略研究——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中国传媒报告》,(1),105-119.
- [Nie,Jinghong & Wang,bo(2013). “Media Frame Alignment”: the Study of City Newspaper Report Strategy on the Citizen Collective Action. *China Media Report*,(1),105-119.]
- 潘永强(2008).《被治理的社会运动:中国环境运动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 [Pan,Yongqiang(2008). *Governed Social Movement:The Political Analysi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Fud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沈海虹(2006).《“集体选择”视野下的城市遗产保护研究》.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 [Shen,Haihong(2006).*Research on the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he View of “Collective Choice”*.Tongj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石发勇(2005).关系网络与中国当代基层社会运动.《学海》,(3),76-88.
- [Shi,Fayong(2005).Relation Network and Grass-root Movement in China. *Academia Bimestris*,(3),76-88.]
- 孙玮(2007).“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PX项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新闻大学》,(3),140-148.
- [Sun,Wei(2007).Who are we? The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in establishing group identification in the New Social Movement:A Case Study on the PX Project in Xia Me. *Journalism Bimonthly*,(3),140-148.]
- 孙玮(2009).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国际新闻界》,(1),118-122.
- [Sun,Wei(2009).An Analyze of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 Reports about China in Its Transition: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18-122.]
- 陶文静(2013).《公共商议视角下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报道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Tao,Wenjing(2013).*Mediated public deliberation on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China*. Shangha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王洪伟(2010).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30(2)),215-234.
- [Wang,Hongwei(2010). Analysis of the Validity and Limit of “Individualistic Resistance” from the Subaltern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A Report from the HIV-Ridden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 and Henan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0(2),215-234.]
- 王金红,黄振辉(2012).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1)),152-164.
- [Wang,Jinhong & Huang,Zhenhui(2012). An Explanation to the Tragic Contention of the Vulnerable Subaltern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 Science Edition*),52(1), 152-164.]
- 吴畅畅,贾佳(2010).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开放时代》,(11),106-132.
- [Wu,Changchang & Jia,Jia(2010).Aids and Homosexual Rights in Mass Media: Textual Study of "People's Daily" and the Urban Newspapers. *Open Times*,(11),106-132.]
- 夏倩芳,袁光锋(2014).“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开放时代》,(1),190-208.
- [Xia,Qianfang & Yuan,Guangfeng(2014).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State" Division, Network Control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flicting Topics. *Open Times*,(1),190-208.]
- 谢颖,林芬(2016).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中产抗争与农民抗争的个案比较.《社会学评论》,4(1),34-48.
- [Xie,Ying & Lin,Fen(2016).Group Differences and Resource Borrowing in Contentious Politic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4(1),34-48.]
- 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2(2),1-23.
- [Ying,Xing(2007).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Expression of the Peasants Group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ases. *Sociological Studies*,22(2),1-23.]
- 于建嵘(2004).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49-55.
- [Yu,Jianrong(2004).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farmers' rights protec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2),49-55.]
- 曾繁旭(2013).传统媒体作为调停者:框架整合与政策回应.《新闻与传播研究》,(1),37-50.
- [Zeng,Fanxu(2013).Traditional Media as Mediator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nd Policy Respons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1,37-50.]
- 曾繁旭,黄广生,李艳红(2012).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东南学术》,(2),80-85.
- [Zeng,Fanxu.,Huang,Guangsheng.,&Li,Yanhong(2012).The class of media resistance: a comparis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iddle class.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2),80-85.]
- 曾繁旭,黄广生(2013).地方媒介体系:一种都市抗争的政治资源.《传播与社会学刊》,(24),119-154.
- [Zeng,Fanxu & Huang,Guangsheng(2013).Exploring Local Media Systems in China: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Urban Conten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4),119-154.]
- 张钊(2012).《城市改造中的草根抗争研究——以N市老城南改造为例》.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南京.
- [Zhang,Zhao(2012).*Grassroots Resistance in Urban Regeneration: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Inner City of N*.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Master Thesis.]
- 郑瑞城(1991).从消息来源途径诠释近用媒介权:台湾的验证.《新闻学研究》,(45),39-56.
- [Zheng,Ruicheng(1991).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ght of access to media from the news sources: Taiwan's cas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 39-56.]
- 郑雯(2015).《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北京:华夏出版社.

- [Zheng, Wen(2015).*Mediated Contention: Transition, Mechanism and Challenges*. 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周裕琼,杨云康(2017).中国社会抗争的媒介策略:基于环保与征地事件的综合比较分析.《传播与社会学刊》,(40),169-201.
- [Zhou, Yuqiong & Yang, Yunkang(2017).Media Strategy of Social Contention in China:Comparing Environmental and Land Requisition Protest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169-201.]
- Andrews, K. T., & Caren, N. (2010). Making the news: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6), 841-866.
- Barker-Plummer,B.(1995).News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Media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U.S. women's movement, 1966–1975.*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3), 306-324.
- Barron,J.A.(1967).Access to the Press. 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 *Harvard Law Review*, 80(8),1641-1678.
- Gandy, O. H.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ew York: Ablex Publ.
- Ho, P. (2007). Embedded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 *China Information*, 21(2), 187-209.
- Meyer, D. S. (1995).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elites: Celebr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65(2), 181-206.
- O'brien, K. J.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 31-55.
- Rohlinger, D.,& Vaccaro,C.(2013).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D. Snow, D. della Porta, B. Klandermans, & D. McAdam (Eds.),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pp. 736-739).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Ryan, C.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pp.61-83). London: Sage Ltd..
-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 Yao, Y., & Han, R. (2016). Challenging, but not Trouble-Making: cultural elites in China' s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8), 292-306.